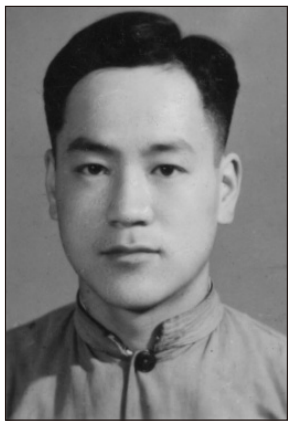


我们班是个解放初期的过渡班

——为毕业 60 周年而作

○钱家骊（1953 电机）



1953 年 4 月于北京结束学生生活（提前半年毕业）

我们年级（以下为叙述方便都简称为班）在 1950 年入学，1953 年毕业。这正是全国高等学校处于大变动的时期，各种事情不断在变化，属于一个过渡时期，这就是我们班的重要特征。

由于大陆刚解放，那时高校没有统一招生，而是沿用解放前的做法，采用分批招生。以北方来说，北大、清华、北洋在一起是一批，哈工大、东北工学院、大连工学院又是一批，燕京、辅仁、天津工商学院等则单独招生。江南的高等学校则不在北方招生。清华当时只在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武汉和成都有关点，大大限制了招生来源，如华南地区没有一个考生。那时，班上有一些从四川大学、湖南大学、贵州

大学、武汉大学和唐山交大转来的同学，也有从本校地质、化工等系转过来的。在大一暑假时还有由北京大学转来的插班生，这种现象在以后其他年级就很少见。

那时的清华大学还是综合性大学，在校内，常常以三个系为一组称呼各系。以学生人数为序则是：机电航、土营采（土木系、营建系、采矿系，当时没有水利系，也没有建筑系的名称），物化生，数气地（数学系、气象系、地质系），文史哲等。还有外语系和农学院等，社会系和心理系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体系，已不许招生。我们班入学时，全校不过 2000 人，到了毕业时已翻了几番了。

1950 年我们电机系一年级共 108 人，号称一百单八将。以后由于院系调整等原因，陆续增人，从名册看已有 198 人。由于参军参干、留苏、到哈俄专进修，提前留校作教师，因结核病留级和做政治辅导员等，1953 年夏天毕业时只有约 150 人了。虽然如此，每个人都领到了本科毕业证书，哪怕是只在清华大学念了不到一年也一样。

刚入学时，我们称作电 1 班，全班分成七个大组，活动按全班进行组织。班上设有总干事，其他干事也只有一名。由于有了这种高班传下来的传统，直到“文革”后聚会时，我们都是全年级在一起，没有

□ 值年园地



1952 年秋，调整到清华的北大工学院同学与清华同学合影

太强的“小班”概念。二年级时分组，分为电力组（下分电机制造组、水利发电组、火力发电组，简称力组）和无线电组（简称讯组）。当时完全是自愿报名，由于当时大力宣传苏联的伏尔加—顿运河和古比雪夫水电站是共产主义工程，报名水电组的人极多，而报火力发电的寥寥无几，最后靠组织动员才成立了火力发电组。三年级时，又完全按苏联方式分专业，全班又分成发 31、发 32、发 33、电 31、无 31 和无 32 班直到毕业。

开始入学时，基本是按英美制教学，但取消了国文和外文。增加了政治课，在大礼堂授课，当时简称“大课”，教师则是吴景超、孙定国等校外邀请的名家。数学、画法几何和工程画等用的都是英文教

材。这些英文教科书都是一家私营龙门书局影印的，但仍价格不菲。大多数同学都是买高年级用过的旧书。在明斋北通向大饭厅的走廊两侧贴着不少出让告示，我们就按时间、地点和价格前去购买。参考书也多是英美书籍。大三时，开始用苏联教材，大二时正是青黄不接之时，没有教科书，只能靠讲义，有的课连讲义也没有，使学习大受影响。我们在校期间，国内出现多次政治运动，包括三大运动——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，三反（反贪污、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）和

五反运动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，忠诚老实运动，捐献飞机大炮活动等，我们参加了其中不少活动，几次下厂下乡，此处不再详述。

清华大学过去的教学传统向来以严著称，但到我们入学时，教师已非常和气没有多少严格的气氛。开始时老师在讲课时还难免说出几个英文词，以后就没有了。大一第一学期，学校还把期末考分全都贴到墙上，但只写学号，不写名字。大一和大二上学期考卷中还有些难题、偏题出现。为此，还出现过部分同学组织起来请愿要求教师加分，最后采用了开方乘 10 的记分方法，得 36 分就可以及格。后来更进一步，考试后干脆连分数也不告诉学生了。直到三年级，学习苏联改用 5 分记分制，

在苏联专家带动下多次出现全班5分的现象。这样除了因病外，淘汰率为0。

入学时，学校只有三个食堂，都在明斋北边。食堂是包伙制，每人每月交6元（当时还用旧币为6万元）饭费。三顿饭基本都是白高粱米，很少大米和馒头。两素一荤的菜盛在铝盆里预先放在吃饭的方桌上，先到的人把它分成8份，先到的先吃，不用等其他的人。每桌固定8个人，没有坐位，只能站着吃。到了周末，北京同学回家，菜就可以少分一份，同桌的人很高兴。一些西南省份来的同学想吃辣的，可以花两分钱到小卖部买一勺辣椒酱过过瘾。这时的食堂由学生会生活部派人管理，从社会找人包厨。这可是麻烦的事，生活干事就忙得够呛，大大影响了学习。到了每月月底，伙食有了结余，可以给大家打牙祭。到了二年级，伙食有了改善，分成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5种伙。甲伙吃馒头，每月3斤肉。乙伙吃大米，3斤肉。丙伙吃高粱米，5斤肉。丁伙是胃病伙，伙食费涨到8元。戊伙吃大米，5斤肉，费用更高。早晨，在食堂门前，有卖白薯、炸糕和炸饺子的，有钱的可以去买。在新斋东北有私人小饭馆，可以去吃馄饨。到我们毕业时，已盖好西大饭厅，不但作为食堂，还可以在里面看电影。电影大幕放在中间，同学自己搬凳子，一半同学看正面，另一半看反面。为了改善伙食，我班第2大组还破天荒地挖了多年没人碰的明斋的地下粪池。同学们意气风发，干劲十足，还编了一首根据捷克歌曲改编的《挖粪吃肉歌》，最后一句是“今天挖粪明天一定要吃肉！”此外，我班一些同学还把一只野狗堵在食堂中，最后吃了一顿食堂帮助

做的烧狗肉。

当时国家刚刚建立，一些建交国家纷纷派出文化团体来华庆贺，我们看了苏联红旗歌舞团以及匈牙利、捷克斯拉夫、波兰、罗马尼亚等歌舞团的演出。还看过歌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评剧《九尾狐》和越剧《龙女牧羊》等。每周六晚看电影，其中包括很多苏联电影如《列宁在十月》、《列宁在1918》、《斯大林在1919》、《斯大林格勒血战记》和《夏伯阳》等。晚饭后常有文娱干事教唱歌，学生会还在饭厅举办过交谊舞会。这就是我们主要的文娱活动。

每年逢五一、十一都要参加天安门游行，为此前若干天就要进行操练，每排20人，要走整齐很不容易。特别是当年天安门两侧的三座门还没拆掉，队伍在此还要分流再合并，到天安门前也就乱成一片了，好在我们都是群众队伍，没有太多要求。

当时虽说有“穷北大，阔清华”之说，班上也没有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，但大多同学都很穷。不少同学都申请助学金，最高额19.5元/月。100多同学中有自行车的2人，有手表2—3块，没有照相机和收音机，只在毕业前夕才有人从家里借出一台。我所在的电机制造组，只有我有一个闹表，这成了我们实习时唯一的计时工具，很派上了用场。当时的闻亭大钟很有用场，上下课和早晚正点都由工友用大锤敲打报时，悠扬的钟声，能一直飘到很远的地方。

我们入学时，看到高班同学都佩戴传统的清华校徽，是蓝紫色倒三角形。但一直到10月后才发给我们新校徽，这是毛主席写的横排式的，学生白底红字，教师则是红底白字。

□ 值年园地

1952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即，国家急需大批建设人才，为此，工学院1949级和我们1950级都立即改为三年制，提前一年毕业，教学内容临时削减了一半，如工业电子学只学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，也没有作毕业论文。根据系里通知，原定的生产实习也由于教师工作太忙，建议取消。由于同学坚持，才由高班同学协助完成了实习。

1950年前，同学只住在明、善、平、新、静各斋。1950年由于学校扩招，在大一时，我们班已无宿舍可住，只能和机械系一年级住在二院平房。十几个人一个房间，没有暖气，靠生煤炉取暖，好处是可以自烤白薯。厕所则远在大院的东头，没有坐式便具，全是蹲坑。冬天半夜上厕所时，只能狂跑，以免在没有外墙的走廊中挨冻。直到大二我们才搬到新斋。女生们则很受优待，住在静斋。入学时，公共教室只有一、二、三、四院。一院是清华学堂，二院在电机馆西，三院在大图书馆南，四院在二教楼处。现在已经看不到二、三、四院了。我们毕业时，已建好了第一和第二教室楼。

那时校内道路很不好，只有西校门到二校门和二校门到原来的南校门两条混凝土路，其他全是土路，有些“无风三尺土，有雨一街泥”的感觉。进城只能坐私营荣宝汽车行的校车，一般每小时一班，终点是东华门。节假日难免就要排大队了。要想购物，校内有合作社，同学都入了股。还有一间私营的文具店，可以买纸、笔等。最近的市镇就是几里地外的海淀镇和青龙桥镇，学校近邻除了燕京大学外，全是农村。京张铁路就在电机馆东，上课时就可

以听到火车的汽笛声。

在我们以前，学生因为负担重，再加营养不良，身体不好的人较多。所以我们刚来校时，就听到在学生中流传“一年级入学，二年级买眼镜，三年级买痰盂，四年级买棺材”的说法，这当然有点夸张，但那时肺结核容易传染，又没有特效药，只能靠营养加静养。我班前后就有11个人住过在静斋的结核病房。我们入学后，毛主席提出“健康第一”，又提出三好“身体好，工作好，学习好”的号召。上级又提出“8150”制，即每天睡眠8小时，一天一小时体育锻炼，每周学习50小时。学校又在学生中提倡长跑，同学健康就有了保障。院系调整后，学习苏联的“劳动卫国体育锻炼制度”，其中包括100m短跑，3000米长跑，还有跳绳，要连续左脚跳40次，右脚跳40次，双脚跳70次，双跳10次。标准有及格和优秀两级，要求每人至少达到及格。这都是解放后的进步。

1953年夏天，我班提前一年毕业了，大家走向生活，工作在祖国各地，但绝大多数都在东北和华北。我班分配的一个特点是为了迎接第一个五年计划，教育要大发展。电机系1947年入学的同学留校的只有一人，1948年入学的只有两人，1949年入学的一个人没有，而我班留校的包括研究生竟有三十多人，真是空前。这些同学多在20岁或稍多，个别同学甚至才19岁就当上了老师，有的同学二十三岁就讲上了主课。此时班上已大多数都是党员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，由于当时认为原有教师几乎都是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”，对于新教师给予很高的期望，于是我班留校的很多人很快成为教学骨

干，几乎包办了各个教研组的秘书职位。当时有个说法叫“秘书专政”，虽不大确切但也反映了相当的实际情况，这也是我班的一个特色吧。

几十年来，我班同学在各个工作岗位

上不断奋斗进取，虽然每个人境遇不同，但都作出了尽己所能的贡献。值得提出的是我班还出了两位将军，这在不属于国防专业的电机系来说应当是很不平常的了。

难忘清华

○王曰平（1963水利）

上京

1957年的高考属“马鞍型”，1956年招生24万人，1958年招生32万人，而这一年全国招生仅10.7万人。这年我们台州考区能有两人考上清华，实属不易，小县城都沸腾了。

我从未离开过小县城，为上北京，9月3日，我与同时考上清华的李谦民同学约好一起走。我们坐的汽车是烧木炭的，车速慢不说，到猫狸岭时人还要下来推车，推过最高处再上汽车。到了杭州已是傍晚，我们排队坐在车站广场上等进站，我把买来的包子放在手提袋上，不料被人一脚踢到地上，又抢去吃了。我俩都是第一次出门，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，觉得外面世界太乱了。第二天凌晨4点，我们坐慢车到了上海火车站。下午4点，才有上海—北京直达学生专列，可凭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免费上车。

有了杭州车站的经历，又听说上海小偷特别厉害，我们连车站广场都不敢去。就这样在候车室足足坐了12小时。我们两人从未见过火车，上车后两人轮流看行

李，从车厢这头走到那头，什么都新鲜。

经过48小时火车的长途颠簸，9月6日凌晨4点，火车停在北京前门火车站，大家兴高采烈地下火车。一离开车厢一阵寒气逼来，我们看到站台上的工人都已穿上棉袄了，而我们却穿着衬衣，有的还穿着短袖呢。好不容易等到早晨6点多清华的校车来了，车上下水八、水九的大哥大姐们，他们拿来棉衣、毛衣给我们御寒。那时坐火车人与行李是分开的，我们一穿就穿了两星期，待我们收到行李后才将棉衣、毛衣送还给大哥大姐们。

进校

新生是住在东区5、6号楼的。进校后已到吃中饭时分，我拿着校区地图找北饭厅，走过小桥，找到最漂亮的4号、3号、2号、1号楼，但就是找不到北饭厅。加上我“洋夹土”的普通话别人听不懂，更不敢问，当时广播喇叭里播送着广东音乐《彩云追月》，事过半个世纪，当我一听到这首曲子，就会想起当年饿着肚子找饭厅的情景。

我被分配到水22班，当时一二年级